

黄庆华 ○ 著

中葡关系史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SINO-PORTUGUESAS

≈ 1513 - 1999 ≈

中 册

黄 山 书 社

D829. 552
H872

黄庆华 ○ 著

中葡关系史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SINO-PORTUGUESAS

∞ 1513 - 1999 ∞

中 册

黄 山 书 社

目 录

(中册)

第六章 清季中葡关系(1840-1911)	499
第一节 鸦片战争与中葡、葡英关系	502
第二节 葡萄牙对《南京条约》的反应	533
一、钦差大臣耆英与澳葡代表谈判	534
第三节 澳门“排他性”管理权的获取	575
一、钉关逐役,开放澳门港口	578
二、掘坟修路,强行殖民扩张	599
三、亚马勒遇刺	623
四、亚马勒案件后的中葡交涉	633
第四节 同治中葡条约	651
一、中葡议约背景	653
二、中葡修约谈判	669
三、条约文本与谋取主权问题	689
四、换文失败与国际舆论	700
五、“埃米利计划”	720
六、换约的最后尝试	728

第五节 光绪中葡条约·····	743
一、筹办洋药税厘并征·····	746
二、赫—罗“拟议条约”·····	752
三、中葡《里斯本草约》·····	769
四、中葡北京议约·····	797
五、《和约》与澳门主权问题·····	816
第六节 中葡澳门勘界·····	824
一、中葡“澳门属地”之争·····	827
二、葡国使节驻京与中葡修订商约·····	852
三、澳门水陆界务纠纷·····	880
(一)“二辰丸”事件与澳门·····	882
(二)中葡澳门勘界谈判·····	895

第六章

清季中葡关系 (1840 - 1911)

从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清王朝封建统治解体,虽然只有 70 年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 70 年时间里,西方列强的频频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断的武力威胁和重重压迫,却将中国置于有史以来最为动荡不安和几近被肢解的地步,使中国由一个原本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最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间,中国所遭受的虽然主要是来自英、美、俄、法、日等强敌的欺侮、蹂躏和践踏,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无能,以及中国积贫积弱、身处任人摆布和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就连西方一些弱小的国家,也开始依附于英、美、俄、法等强国,纷纷要求与清政府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和章程,以争取与列强利益均沾、享受最惠国待遇。

从 16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在寓居澳门的 300 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在葡萄牙人社区的管理自治方面,还是在对华通商或从事国际转口贸易方面,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皇帝的格外施恩,享有与其他外国人不同的优厚待遇。时至 19 世纪末叶,葡萄牙虽然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势力和辉煌,成了欧洲弱小、

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传统的中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葡萄牙人依靠西方列强的势力,不仅向清政府公开要求与列强利益均沾、要求享受超出中国给予列强的待遇,甚至还暗中谋求澳门的领土主权。因为,葡萄牙人深知,“葡萄牙对澳门只有使用权(*dominio útil*,受益权)而无主权(*dominio directivo*,领导权),即便是这种使用权,也是有条件的,而其中的主要条件就是,不准许(将澳门)转入他国之手。”^①

葡萄牙政府为了通过与清朝政府订立条约,合法地占据澳门,使澳门成为香港式的葡萄牙殖民地和开放口岸,最终实现夺取澳门领土主权的夙愿,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就开始酝酿遣使中国,企图借助英国的侵略势力,迫使清政府解决澳门的法律地位问题;中英《南京条约》墨迹未干,又迫不及待地派遣代表向清政府提出了有关将整个澳门半岛及其附近地区划归葡萄牙所有、放弃对澳门领土的管理权、将澳门开辟为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等要求。然而,葡萄牙政府提出的这些无理要求,却遭到了清政府的严词拒绝。此后,至19世纪40年代末,澳葡当局在葡萄牙政府的指使下,先后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撤销葡萄牙在澳门的海关、以武力钉闭中国税馆并驱逐丁役、在澳门半岛及其附近进行武力扩张,并且在港英当局的武力支持下,借端赶走中国驻扎澳门之香山县丞、拆毁县丞衙署,并且在夺取了对澳门的排他性管理权之后,开始对澳门实行全面的殖民统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葡萄牙吸取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教训,积极主动且想方设法地向英、法靠拢,希望能于英法联合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中分得一杯羹,与英法

① 澳门法官呈葡萄牙内阁报告(1840年2月15日)。*Ofício do Jutz de direito de Macau, José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 para o Barão da Ribeira Sabrosa,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Ministros* (15 de Fevereiro de 1840), in Alfredo Gomes Dias, *Macau e a I Guerra do Ópio*, pp. 169-171.

侵华代表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迫使清政府通过签订条约,改变澳门的法律地位。不过,由于澳葡当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初期“保持中立”,战争期间又没有向英国侵略军提供令人满意的支持,以及英国人不希望香港的近旁出现或存在贸易竞争对手,以致葡萄牙政府及澳葡当局的一番辛苦和努力未能取得任何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尘埃刚刚落下,葡萄牙虽然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法国驻华公使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和好贸易章程》,但是,因为这项条约是葡萄牙议约代表通过欺诈手段订立的,以及葡萄牙的阴谋在签订条约之后不久即被清政府识破,所以,条约换文时,清政府要求葡萄牙换约代表对条约中有关澳门主权的条款做出解释并酌加修改,否则,不能互换批文。由于葡萄牙此次立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欺诈和玩弄文字的手段,骗取澳门领土主权,葡萄牙换约代表既不可能同意对相关条款加以解释,也不可能做出任何改动。在此后的25年间,葡萄牙政府虽然为换约做过多方面的努力,但是,由于得不到列强真诚、有力的支持,该条约始终未能换文生效。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为了防止鸦片走私和偷漏关税,并在香港和澳门落实洋药税厘并征的税收政策,不得不因为英国与葡萄牙攀比,并且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煽惑之下,与澳葡当局正面接触,希望得到澳葡当局的真诚合作,于是,葡萄牙不仅有了向清政府漫天要价的难得机会,而且还在总税务司赫德的直接参与和策划下,先后同清政府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及北京《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以下简称《光绪中葡条约》),最终取得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的权利。不过,从“永居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的规定来看,葡萄牙通过签订这项条约,所得到的仅仅是澳门及属澳之地的居住权、使用权和管理权,而不是澳门的领土主权。在勘定所谓“属澳之地”界址方面,条约虽然规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但

是,由于清政府没有及时并设法促使葡萄牙政府履行条约的有关规定,派员妥为会订,因此,又为葡萄牙日后在澳门附近肆意扩张提供了机会,致生界务纠纷。

《光绪中葡条约》签订并换文之后不久,葡萄牙即违背《条约》的有关规定,开始在澳门附近各岛屿不断进行武装扩张活动并制造各种事端,清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要求葡萄牙政府派员会订澳门界址。于是,中葡两国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年)初夏,分别简派大臣——云南交涉使高而谦、葡萄牙将军马沙度(Joaquim José Machado),在香港举行澳门界务交涉。双方迭经磋议,历时数月,及至宣统二年(1910年)葡萄牙爆发革命前夕,香港澳门勘界会议迄无结果。未几,清政府复派出使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大臣刘式训,前往里斯本续议澳门界务。然而,由于葡萄牙政府及澳葡当局节外生枝,里斯本澳门界务谈判亦无法正常进行。民国初年,中葡两国有关澳门界务的交涉虽然未曾中断,但始终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此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中国内战及日本侵华战争等,澳门勘界问题便被无限期地延宕并搁置起来。

第一节 鸦片战争与中葡、葡英关系

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获准寓居澳门,至19世纪中叶,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在这将近300年的时间里,由于历史、政治和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原因,澳门葡萄牙人始终不欢迎来华通商贸易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其他国家的商人长期逗留或居住澳门,甚至不允许他们的商船停泊澳门。清乾隆以后,尽管北京朝廷曾经特准马尼拉之西班牙商人暂入澳门贸易、越冬或居住,且西班牙对华贸易本来无多,澳葡当局亦未对西班牙商人表示宽

容。当然,澳葡当局也不是对所有要求入澳贸易或留寓的西方商人概行拒绝,只要对他们有利,他们照样准许。葡萄牙人对待西方其他国家来华贸易商人的这种态度,对外解释起来,也是振振有辞,甚至可以拿出充分、有力的依据:“澳门这块土地的主人是中国皇帝”,而且,“中国官府有令,不准其他国家商人和船只进入澳门”,葡萄牙人不敢擅做主张。然而,葡萄牙人的这套说辞,其真实用意绝不是出于遵从中国官府的谕令,更不是出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守卫中国领土,使澳门这块中国领土不受外来者的侵犯,而是为了防范西班牙、荷兰及英国人侵占澳门,实现葡萄牙人继续独占澳门、垄断中西贸易的目的。不过,随着西方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海上势力的迅速崛起和东渐,以及葡萄牙海内外势力的逐渐衰败,葡萄牙人不仅失去了独占澳门和垄断中西贸易的能力,而且,澳门社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在逐步恶化。葡萄牙人没能始终垄断中西贸易,除了葡萄牙人早已不具备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胜的能力,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以降,清朝政府虽然不积极支持和鼓励中国商人出洋贸易,但至少不反对英、美、法等国家来华通商,因为外国商船到中国东南沿海通商贸易,毕竟可以给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一定的收入。如果说葡萄牙人在西方列强的威胁和进攻面前仍然实现了独占澳门的愿望,那不过是因为清朝政府沿袭明代旧例,给予了澳门葡萄牙人一些优厚甚至是特殊的待遇和保护。例如:在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的同时,只允许西方其他国家来华贸易的商人在澳门葡萄牙人社区租房越冬,而不允许他们长期居住,更不允许他们侵占澳门等。明末、清初,乃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广东官府几次派兵击退荷兰人和英国人对澳门的进犯,已经充分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管理澳门这个葡萄牙人居留地的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以及中国政府对葡萄牙人的格外关照。

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由于英美等国对华贸易的不断增多,以

及清政府放松了对澳门的全面管理,特别是清政府在广州、黄埔等地严查鸦片之后,英美烟商纷纷从广州逃往澳门,这对穷困的澳门葡萄牙人来说,无疑是一条生财之道,澳葡当局遂准许葡萄牙人向英美商人出租房屋,并且允许他们在澳门设立货栈、囤积鸦片,以便收取租金和货税,维持澳门生计。外国商人到澳门租赁房屋居住,始于嘉庆末年。而越来越多的外国烟商涌入澳门,则始于道光中期,即清政府严厉查禁鸦片走私期间。澳葡当局允许英美鸦片商人居澳门的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清政府有关其他外国商人非越冬不得居住澳门的规定,那么,允许英美鸦片贩子藏匿澳门或在澳门设立货栈囤积鸦片,则更违反了清政府有关禁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法令。此外,对于清政府查禁鸦片、不许英美鸦片商居住、藏匿澳门等一系列严格规定,葡萄牙政府并非一无所知。然而,澳葡当局这种违反清政府规定的做法,却得到了里斯本政府和印葡当局的支持。尽管澳葡当局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准许英国烟商暂住澳门,但从总的方面来看,葡萄牙人仍然对英国人持戒备和防范的态度。

道光元年至二十年(1821-1840年)的20年时间里,由于澳葡当局向入澳英国烟商收取高额费用,以及广东官府在澳门严查鸦片、禁止英国烟商逗留澳门的缘故,英国人曾暂时离开澳门,并且将鸦片陆续贮存在伶仃洋面和香港水域的趸船上,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以及后来英国政府委派的官方代表——“驻华商务总监督”等^①,却始终驻扎在澳门,并且穿梭于澳粤之间。他们不仅在那里直接操纵和设法扩大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而且还积极策划侵华战争。所以,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澳门不仅是外

① 为了打破贸易垄断,鼓励并扩大英国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1833年在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同时,委派“商务总监督”代表政府常驻中国。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督是律劳卓(Lord Napier),1834年来华。

国奸商从事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的中心,而且也成了英国刺探中国情报和策划侵华战争的基地。^①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因为葡萄牙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使里斯本政府无暇顾及澳门,如果不是因为

① 英国商务总监督律劳卑刚刚来华不久,即致函外交大臣,要求从印度调派舰队“占领珠江东部入口处的香港岛”。律劳卑去世后,继任商务总监督罗宾逊(G. B. Robinson)又于1836年1月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主张武装占领香港岛或大屿山。1836年6月接替罗宾逊出任商务总监督的,是“一向以扩大对华鸦片贸易为己任”、并且于1839年9月在中国东南沿海挑起第一次中英武装冲突的英国水师总兵义律(Charles Elliot)。此后,义律虽曾获准以“领事身份留居广州”,但他大部分时间仍是住在澳门。参见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2、40页;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在华传教政策》,上卷,第152页。

葡萄牙与英国之间存在种种矛盾及复杂和特殊的关系^①,如果不是因为澳葡当局在以林则徐为首的广东官府的压力下将英国人请出澳门,以及如果不是澳葡当局于中英冲突之初尚不知“鹿死谁手”的情况下采取了所谓的“中立”态度,澳门很可能早就成了中英交战的战场,或者英国侵华的根据地和大本营。而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兼水师提督义律(Charles Elliot)一再借口帮助葡萄牙人防御中国的进攻,屡次要求派遣战舰和兵力驻扎澳门,不仅证实英国人企图占据澳门,更说明英国人在占据澳门之后,准备将澳门作为军事基地,进而发动并扩大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虽然在对澳门行使行政、司法和税收等主权方面,对澳门葡萄牙人颁布过许许多多的法令、法规和章程,同

① 经过数年的激烈战争,法国军队终于在1814年从葡萄牙撤出。葡萄牙境内的反侵略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葡萄牙在本土以外的战争却仍在继续,国王还是不能返回里斯本,只好继续滞留巴西,遥控国内由几位总督组成的政府,直至1821年。在此期间,葡萄牙依旧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19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内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葡萄牙,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836年至1840年,里斯本政府基本上是在拥护1822年民主宪法的“9月革命派”的掌握之中,但葡萄牙的政治局势仍然十分动荡不安。其间,1836年11月,葡萄牙发生了一次反对民主宪法企图恢复1828年宪章的宫廷政变。支持这场政变的是比利时和英国,英国甚至派海军舰队登陆葡萄牙。比、英两国支持此次葡萄牙宫廷政变的条件是,如果政变成功,葡萄牙将把非洲的一个海外省奉送给它们。然而,此次政变并没有成功。1837年7-9月,葡萄牙的许多城市又发生了由高级将领领导的拥护1828年宪章的兵变。据说,这次“暴动”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因为他们反对葡萄牙政府采取的缩减进口贸易的政策。1838年春,政府军血腥镇压反对现政权的兵工厂工人,数百名工人被残酷屠杀。1838年以后,直至1850年,葡萄牙政府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国内的政治动乱。参见J. H. 萨拉依瓦著,李均报等译《葡萄牙简史》,第272-300页。

时也对葡萄牙人实行了种种优惠政策,并且给予葡萄牙人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利,但是,由于葡萄牙人得陇望蜀、贪得无厌,以及香山县丞、税馆官员、澳门同知乃至广东大宪等,对澳门管理不善,甚至徇私舞弊,并且常常借口“怀柔远人”,对澳门葡萄牙人的违例犯禁等行为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所有这些,不仅使澳门葡萄牙人逐渐养成了对地方官府阳奉阴违和以金钱贿赂的习惯,同时也使中国政府的法令、法规和章程遭到了严重破坏。尽管如此,遇有重大问题,澳葡当局在金钱贿赂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还是不得不顺从广东官府,依法行事,否则,澳门葡萄牙人就会面临被中止贸易和断绝接济的严厉制裁。因为,澳门葡萄牙人无论是在防卫方面,还是在经济贸易和日常生活方面,都要依赖于中国政府,“就连他们的去留,都取决于中国皇帝的喜怒”。在中国本身没有遭遇外敌侵略、欺凌和侮辱的情况下,澳葡当局乃至里斯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及地方官府的态度,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恭顺,甚至是“敬畏”的。然而,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英国赢得了这场侵略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不但澳门葡萄牙人彻底改变了以往对广东官府恭顺敬畏的态度,而且葡萄牙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葡萄牙对华政策发生变化,也是有着一个发展过程的。从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驻扎广州查禁鸦片,到中英冲突初起的这段时间,通过林则徐雷厉风行严查鸦片的活动,并以断绝接济、封锁澳门、中止贸易等严厉措施,逼使英国商人交出鸦片、离开澳门,澳葡当局只是看到了清政府欲将鸦片流毒“净绝根株”的决心,但它却没有预料到英国会借此发动一场侵华战争。通过英国鸦片商向钦差大臣林则徐呈缴鸦片、撤离广州退居澳门,以及在林则徐下令封锁澳门、严禁接济英人的情况下英国烟商又被迫携眷从澳门撤出并转入船上或香港岛等一系列行动,澳葡当局以为英国人没有能力与清政府抗衡。它万万没有想到,英国人是在做战略上的退却,

是在等待援军,准备对中国宣战。因此,当英国人请求澳葡当局准其暂住澳门时,澳葡当局遂以清政府不准许外国人居住澳门为由,拒绝向英国人提供庇护,与此同时,由于葡萄牙人对英国人缺乏信任,担心英国人借口保护澳门而占据澳门,也婉言谢绝了英国人有关协助保护澳门以防清政府派兵进攻的请求。从表面上看,澳葡当局的这种做法,至少是一种顺从清政府的表示,对英国人的请求表示爱莫能助,但实质上,澳葡当局采取的是一项希望在出现任何不测的情况下,都能够左右逢源的政策。因为,在中英冲突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澳门葡萄牙人的这块居留地也同样岌岌可危,澳葡当局明确表示支持任何一方,都是一种冒险行为,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与清政府联盟,打击英国人,那么,一旦清政府失败,澳门将迅速被英国人占领;如果与英国人为伍,共同对抗清政府,那么,一旦英国人失败,葡萄牙人势必被清政府逐出澳门。如果说在中英武装冲突初期,澳葡当局的态度是“首鼠两端”,那么,随着中英战争爆发和迅速升级,以及英军的步步进逼和清军的节节败退,里斯本政府及澳葡当局不仅在对华政策上,而且在对待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态度上,也开始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28日向钦差大臣林则徐呈缴20,283箱鸦片之事,绝非英国人情愿之举,而是在林则徐采取强硬措施,下令封锁商馆、断绝供应的紧急情况下,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保证将来偿还烟商损失为前提,经过反复劝说之后,英国烟商才勉强交出来的。因此,莫说英国烟商,就是义律和英国政府,也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迟早要对中国采取报复行动。对于这一点,澳葡当局及里斯本政府都有所认识。至于英国人何时对中国进行报复,以及英国人的报复能否取得成功,则是里斯本政府和澳葡当局无法预料的。

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驻扎广东查禁鸦片之初,在通谕广州外商呈缴鸦片的同时,就曾谕令澳门同知转饬澳葡当局:一、将现存

鸦片全数缴出；二、禁止英国烟商前往并藏匿澳门。然而，英国烟商在被迫离开广州之前，也只好选择澳门为暂时栖身之所。1839年3月22日，义律照会澳葡总督边多(Adriã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请求允许广州英国商人转入澳门并给予全面保护。^①一时间，澳葡当局为此颇感进退两难，既不能公开对抗清廷钦差，又不敢轻易得罪英国，于是，澳葡当局便对林则徐的谕令采取阳奉阴违的对策，一面发布通告要求呈交鸦片，一面指使葡萄牙及其他外国烟商迅速将所囤积的数千箱鸦片转移到马尼拉^②，并且在声称“只保护守法英国侨民”的同时，遵照里斯本政府及印葡总督的旨意，准许大批英国烟商入居澳门。1839年4月13日，义律发布《告英王陛下臣民书》，内称：只要英国人不在澳门从事违犯中华帝国法律的商业贸易活动，澳葡当局即允许其居留该地并给予权限内的保护。同日(4月13日)，即部分英国烟商因拒绝出具甘结而被困在广州商馆期间，义律又致函澳葡总督边多，请求保护在澳英国臣民的身家性命及财产船只，并且许诺：必要时，英国可以派遣兵船，协助澳葡当局防御澳门和氹仔。4月15日，澳葡总督边多回复义律，以其个人名义并代表葡萄牙政府，对于义律有关协助防御澳门的许诺表示感谢。同时，他也指出：由于形势特殊，澳葡当局必须严守中立，尽可能保护澳门英国人的生命财产，但不包括(义律

① Alfredo Gomes Dias, *Macau e a I Guerra do Ópio*, Tipografia Mandarin, Macau, 1993, pp. 107-108.

②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I - *Ruas com nomes genéricos*,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9, p. 199; Alfredo Gomes Dias, *Macau e a I Guerra do Ópio*, p. 137;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Série Especial Vol. I,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8, pp. 58, 68.

在)3月22日照会中指出的例外情况,即英国鸦片烟商。^① 义律对澳葡总督的这种答复自然不会感到满意。义律在5月6日自广州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的报告中强调:就目前的特殊情况而言,澳门的安全对英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对葡萄牙政府来说,则比较次要。葡萄牙在澳门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根本不足以抵御中国的进攻。因此,陛下政府应立即与葡萄牙政府交涉,或者要求葡萄牙政府将澳门的权利让给英国,或者由陛下政府保卫和使用澳门。^②

葡萄牙人是以交纳地租的方式借居澳门的,因此,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一样,对澳门的法律地位十分清楚。他们从不认为葡萄牙对澳门拥有什么主权。他们也承认,葡萄牙人通过纳租,只是取得了在澳门半岛上的居住权,而诸如行政、司法、税收等主权,仍然属中国皇帝所有。这就是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义律等迫切希望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澳门并将其变为英国进攻中国的军事基地,以及英国政府对葡萄牙政府就英国战舰曾经擅闯澳门提出的抗议感到不以为然,甚至就澳门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质问葡萄牙驻伦敦公使的原因所在。^③ 正是由于里斯本政府及澳葡当局自己

① *Capitain Elliot to Don Adrião Acacio da Silveira Pinto, Portuguese Governor of Macao* (April 13, 1839), in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Série Especial Vol. I, pp. 93-95.

② *Capitain Elliot to Viscount Palmerston* (May 6, 1839), in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Série Especial Vol. I, pp. 91-93.

③ *Nota do Secretário da Legação Portuguesa em Londres para o Ministr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19 de Setembro de 1840), in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Série Especial Vol. I, pp. 136-138.

也认为葡萄牙并不拥有澳门主权的缘故,在英国远征军寻觅不到落脚之地,以及中英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葡萄牙政府为了避免因为参与这场战争而有可能失去澳门这块居留地,对澳葡当局采取的所谓“严守中立”的政策表示赞赏和支持。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1839年5月24日),颠地(Lancelot Dent)等十几名顽固的英国大鸦片商被迫向林则徐出具甘结,保证今后再不来中国,其他商人也保证不再夹带鸦片来广东贸易,同时领取了粤海关监督签发的赴澳执照后,才在义律的带领下,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义律回到澳门之后,更加紧了与印度英国当局及英国政府的联系,要求伦敦政府迅速派遣武装舰队来华,首先占领澳门,然后向中国政府宣战。10月1日,英国政府在收到义律自1月中旬连续发出的多次请求报告之后,决定派舰队前往中国。未几,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又先后训令印英总督和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密切合作、准备作战。^①

1839年7月7日(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英国水手登陆尖沙嘴,醉酒之后,无故将村民林维喜棍殴致死。钦差大臣林则徐得报后,迅疾谕令义律交出凶犯。然而,一个月时间过去了,驻扎在澳门的义律仍拒绝交凶,澳葡当局出面转圜亦无济于事。林则徐为了维护天朝法律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只好援引嘉庆十三年(1808年)广东官府制裁据澳英国海军司令官度路利(B. Drury)之案为例,于七月初八日统领官兵进驻香山,采取勒兵封锁澳门、

^① 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1840年2月20日)及其训令,见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2-76页。